

退休老人與大學生在生活場域中的關係與面子

蘇珊筠 黃光國

國立台灣大學心理系

論文編號：02018；初稿收件 2002 年 8 月 12 日；完成修正：2002 年 10 月 18 日；正式接受：2002 年 11 月 25 日
通訊作者：蘇珊筠 台北市文山區光輝路 76 號 2 樓 (E-mail: sueyaw@venus.seed.net.tw)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探討：處於不同生活場域的老年人與大學生，在面子事件的感受方面，有何差異性存在。依據過去研究發現與理論的推演，本研究提出三個命題：(1) 老年人所感受的面子事件，較多涉及他在親密社會中賦予的地位，亦即他在親密社會中為人父母的輩分；而大學生所感受的面子，會較著重在運作社會中獲致之地位，亦即身為一個學生的課業成就表現；(2) 和大學生相較之下，老年人所認定的面子事件，較多涉及親近他人的行為表現；(3) 不論是老年人或大學生，都會注重維護其道德性的臉面。同時並以三項實徵研究的資料來說明上述命題。研究一以訪談方式，蒐集老年人（高齡組）與大學生（低齡組）對「有面子/沒面子」事件的看法。結果顯示：確實有上述三項命題所主張的趨勢存在。研究二以配對比較作業，探討研究一所得到的結果。結果顯示：在有面子方面，老年人對「子女品德」與「子女成就」的正向事件感到最有面子，大學生則是對「自己成就」與「自己品德」的正向事件。在沒面子方面，老年人與大學生都是對「自己品德」的負向事件感到最沒面子。研究三要求參與者評估自己受到不同社會對象公開批評的面子感受，結果顯示：最可能讓老年人感到沒面子的是受到「子女」公開指責；對大學生來說，則是「老師」。

關鍵詞：生活場域、面子感受、關係、親近他人

如眾所知，重視「面子」是華人社會行為最為明顯的特色之一。以往曾經有許多社會科學工作者

試圖從不同的角度，來探討中國人的「面子」行為（Hu, 1944; Stover, 1974），其中也不乏心理學者（Ho, 1976; 1994; Hwang, 1987; 1997; Ting-Toomey, 1990）。然而，心理學者在以實徵方法，探討此一問題的時候，大多是採用「特質論」（trait theory）的立場，以人格心理學的研究取向，探討參與者對「面子」的重視程度（朱瑞玲，1988, 1989；陳之昭，1988；Chou, 1997）。從西方社會心理學的角度來看，「面子」是個人在一特定情境中的自我認同，即所謂「特定情境中的認同」（situated identities; Alexander & Lauderdale, 1977; Alexander & Rudd, 1981; Alexander & Wiley, 1980）。在本文的論述中，我們將反覆說明：對華人而言，「面子」的意義，並不僅只是如此而已。可是，從這個角度來看，處於不同生活場域的退休老人與大學生，其面子感受也應當有所不同。因此，本文特別以這兩個群體作為研究對象，採取「互動論」（interactionism）的立場，突顯「面子」在華人社會中的特色。

本論文將先闡述「生活場域」的概念，說明老年人與大學生在生活場域方面的差異，然後提出一個概念架構，再逐步說明本研究關於此一主題的設計。

一、生活場域與面子

在「儒家關係主義與華人的臉面觀」一文中，黃光國（2001）引述許烺光的論點，將一個人主要的「生活場域」區分為「運作社會」（operative society）與「親密社會」（intimacy society）兩種。在前者，個人之所以與他人建立關係，主要是因為他人有助於個人目標之達成，是屬於一種「工具性關係」（instrumental ties）；在後者，個人與他人之間的關係建立在彼此的感情交流之上，是屬於



「情感性關係」(expressive ties)。社會護航理論(social convoy theory; Kahn & Antonucci, 1981)與社會情感選擇理論(socioemotional selectivity theory; Carstensen, 1991; 1992)認為：每個人在人生的不同階段，都會選擇最適當的社會對象，與之進行互動，藉以滿足個人的不同需要；並幫助個人度過不同的生命危機。從這個角度來看，大學生正準備要進入各種不同的社會系統中工作，他們進入大學的重要目的，一方面是要學習各種知識體系，作為未來就業之用；一方面則要和他人建立混合性或工具性的關係，以磨練人際關係的技巧。他們在學校中的互動對象，大多屬於運作社會中的成員。

相反的，當一個人年老退休之後，他逐漸從運作社會中退出，他日常生活與之進行互動的社會網路以及對他提供社會支持的成員種類會逐漸減少，他們所選擇的互動對象，通常會提供給他情感的支持，大多屬於親密社會中的成員。當然，老年人與大學生生活場域的改變，是一種相對性的說法。也就是說，和大學生相較之下，退休老人的生活場域逐漸移至親密社會；和老年人相較之下，大學生的生活場域則逐漸移向運作社會。從「儒家關係主義」的角度來看(黃光國, 2001)，老年人和大學生的生活處境正好形成一種明顯的對比。職是之故，本研究刻意以老年人與大學生作為參與者，探討他們在「運作社會」與「親密社會」中的面子感受。

二、地位與面子

以往有許多學者指出：華人社會中的臉面觀，主要可以區分為「社會臉面」與「道德臉面」兩大類(金耀基, 1988; 黃光國, 2001; Cheng, 1986; Hu, 1944)。對於生活在上述兩種不同場域的老年人與大學生而言，這兩種臉面各有不同的意義：在「運作社會」裡，社會地位是個人藉由自身的才能、努力、或能力，而得到的「獲致之地位」(achieved status)(黃光國, 2001)。對大學生來說，「獲致之地位」主要是藉由他在學校中的課業表現所決定的。在大學生所處的學校系統，「老師」是一個能夠評估其成就表現的權威角色；大學生通常會希望他在學校的表現能夠受到社會的認可，尤其是「老師」對他們的肯定。一旦個人成就表現遭到老師的否定，他便可能覺得沒面子。

在「親密社會」裡，社會地位是由個人出生時具有的血緣關係所決定的。這種「賦予之地位」(ascribed status)，應當是退休老人所重視的。「面子」的主要來源之一，是互動雙方的權力差異所造成的恭敬與服從之態度(周美玲與何友暉, 1992)；在講究倫理秩序的親密社會裡，相對於其他互動對象而言，老年人通常扮演著社會關係中的

「尊者」，尤其是對自己最親密的子女，更是一種明顯的上對下或尊卑角色對待的關係(楊國樞與莊耀嘉, 1997)。逐漸退回親密社會中的老年人，可能不再覺得事業成就對他們的面子感受有太大的重要性；相反的，他們所重視的很可能是：子女對自己的言語行為表現是否違背了「尊尊原則」(黃光國, 2001)，使他們覺得自己沒有得到應有的尊重。換言之，老年人的面子感受，主要是源自於他們在家庭中為人父母的地位。

至於道德臉面，在華人社會中，它代表的是社會對於個人自我道德品格完整性的信任(Hu, 1944)。因為它是一個人做人的基本底限，所以不論是在運作社會還是在親密社會，個人都必須擁有道德臉面。維護道德臉面的原則，並不會隨著生活場域的改變而受到影響，每一個人無時無刻都必須保護自己的道德臉面，但他卻不會在任何時候都想要社會臉面。因此，老年人與大學生對道德臉面的重視應當沒有太大的差異。

三、「親近他人」與面子

個人的「面子」感受，除了要顧慮到社會對個人行為表現的評價，還要顧慮到社會對其「親近他人」行為表現的評價(Ho, 1976)。陳之昭認為面子是「在自我或自我涉入的對象所具有且為自我所重視的屬性上，當事人認知到重要他人對該屬性的評價後，所形成具有社會意義或人際意義的自我心像」(陳之昭, 1988)。陳之昭所說的「自我涉入對象」與何友暉的「親近他人」，都是指與自我有關的人，他們是個人可能對其產生一體感的重要他人，包含在個人「自我的領域」之內，成為「大我」的一部分。一般而言，與個人關係愈親密的家人，愈可能包含在自我的範圍之內；尤其是父母與子女間的關係，華人經常將之視為一體(黃光國, 2001)。

雖然親近他人的行為表現可能增添或減損個人面子，但是對於老年人與大學生這兩個不同的群體，他們的影響，卻可能有所不同。由於面子的運作需要消耗資源，退休老人本身擁有的資源，例如：健康、認知能力(蘇建文、程小危、柯華蒞、林晃文、吳敏而、幸曼玲等人, 1997; Rybush, Roodin, & Hoyer, 1995)、金錢(徐麗君、蔡文輝, 1985)、與時間(Boden & Bielby, 1983)等，都逐漸減少；對他們而言，要依賴自己的成就去爭取面子較為困難。他們不再能靠個人的能力去爭取社會臉面，當他們想要「有面子」時，關注的焦點很可能放在「親近他人」上，以「親近他人」的表現，做為獲得面子的來源。在華人文化傳統裡，對為人父母者來說，子女是自己生命的延續，也是人們晚年時期重要的情感支柱，這種認同會使父母特

別重視子女表現好壞。因此，對老年人來說，所謂的「親近他人」通常是子女。

相反的，在生命發展階段處於成年早期的大學生，其身體的敏捷性、速度與強壯等各方面都逐漸邁向生命的高峰。在生理條件良好的狀況下，他們的發展任務是完成教育、從事工作、結婚以及為人父母（蘇建文等，1997）。個人必須學習獨立，以迎接未來多樣發展的可能性。大學生在學校中學習各種專業知識，就是準備由親密社會進入運作社會；他們必須在學校中表現個人的能力，獲得他人的肯定，以爭取社會臉面。由於他們所強調的是自我的行為表現，「親近他人」的表現好壞，對他們來說，是次要的事情。

在個人覺得「有面子」的感受方面，老年人可能以子女表現為重，大學生則會重視個人表現。但是，在面對可能「失面子」的情況，不論是老年人或大學生，都會關注個人行為。因為華人持有「面子」的基本原則，是要「維持」住個人原本所擁有的面子，即使不能獲得與增添面子，也不能減損原有的面子；這是個人對「面子」的防衛性保護。「有面子」，不一定會增加個人的自尊；但是「沒面子」，必定會損害個人的自尊。尤其是不可失去的道德臉面，這個原則會更為明顯。因為個人所擁有的道德臉面是最基本的，它只有一個，不像社會臉面那樣，可以有很多個（Cheng, 1986）。個人的道德臉面一旦喪失，就很難再挽回。由於避免失面子是對個人的一種保護，而不是爭取社會成就，因此和社會臉面的損失相較之下，失去個人道德臉面可能引發較強烈的沒面子感受。

四、研究架構

「面子」是個人在一社會情境中主觀的心理感

受。一個面子事件的發生，每個人的感受不盡相同。不過，處在相同生活場域的群體，由於他們所重視的面子來源相近，在面子感受上也較為相似。本研究主要的目的是：藉由個人對面子事件的感受，反映出生活場域不同的老年人與大學生，其「面子」來源的差異。綜合以上各節的論述，可將本研究的概念架構列於表一。

在表一中，「面子來源」為本研究所要操弄的獨變項；「面子感受」（有面子或沒面子）為主要測量的依變項。表中所敘述的內容，則為研究者預期得到的結果。本論文共包含三個研究，將以三種不同的方式，說明上述的論點。

研究一：老年人與大學生對面子事件的看法

依照本文引論的分析，個人對自身「面子」的知覺，是他在某一種「情境中的認同」（situated identities）。位於不同生活處境中的個人，追求不同的人生目標，抱持不同的價值觀念，可能使其產生「有面子／沒面子」之感受的社會事件，也會有所不同。為了說明這一點，本研究將以老年人和大學生為對象，分別探討可能讓他們感到「有面子／沒面子」的社會事件。

基於本文的引論以及表 1 的概念架構，本研究針對老年人與大學生對於面子事件感受的差異，做出三項推論：（1）老年人所感受的面子事件，較多涉及他在親密社會中賦予的地位，也就是他在親密社會中的人際關係；而大學生所感受的面子，較著重他在運作社會中獲致之地位，也就是身為一個學生的課業成就表現；（2）和大學生相較之下，老年人所認定的面子事件，較多涉及親近他人的行為表

表一

本研究之概念架構：退休老人與大學生面子來源的對比

群體	退休老人	大學生
面子來源		
社會臉面	賦予之地位：為人父母的輩分	獲致之地位：課業成績表現
道德臉面	不做違反道德原則事，不可失去	不做違反道德原則之事，不可失去
親近他人表現或個人表現	有面子：重視子女表現 沒面子：重視個人表現	有面子與沒面子：重視個人表現
處於面子威脅情境中，較可能使個人感到沒面子的關係對象	子女	老師
關係對象與個人的親近性	高	中
關係對象對個人的權威性	低	高

表二
高齡組與低齡組參與者提及各類面子事件的人數

	能 力				品德	尊重尊嚴	行為失誤	人際關係	子女表現	
	健康	錢財	身分	助人						
高齡組 (共十人)	有面子	6	3	2	2	0	1	0	0	7
	沒面子	5	2	1	0	2	4	1	2	4
	總計	8	3	3	2	2	5	1	2	8

	能 力				品德	尊重尊嚴	行為失誤	人際關係	親友表現	
	課業	錢財	被肯定 (重視、稱讚)	做事能力						
低齡組 (共十人)	有面子	5	1	7	4	0	0	0	1	3
	沒面子	5	0	0	2	4	5	6	2	1
	總計	8	1	7	4	4	5	6	3	4

註：上表中的數字代表人數。當參與者在有面子與沒面子感受方面，皆提及某一類事件時，則在此類事件的總人數上，以一人次計算。因此在每類型事件中，總計人數不一定等於有面子事件人數加上沒面子事件人數。

現；(3) 不論是老年人或大學生，都會注重維護其道德性的臉面。這樣的推論，是從有關華人臉面的理論推演出來，然而，參與者在其生活世界裡，是否真的有這樣的想法？研究一的目的，是要用深入訪談的方法，探討老年人與大學生對於「有面子/沒面子」事件的認知，是否可以反映出上述三項論點。

參與者。本研究之參與者為 65 歲以上之老年人（高齡組）與大約 18 至 24 歲的大學生（低齡組）各十位（其中男女各半）。不論是生物學、心理學與社會學等不同領域，對「老年」都有不同的界定，很難獲得一個統一的說法。大多數的國家以六十五歲為退休年齡，人口統計學則將六十五歲以上的人列為老年人口。雖然以生理年齡來界定老年，並不是最理想的方式，但是由於沒有其他更好的指標（陳美光，1998），因此本研究以六十五歲作為選擇老年訪談對象的依據。本研究的參與者是居住在台北地區的老年人，以不集中在某一教育程度上為原則：10 位參與者中，教育程度為小學或小學以下者共有 3 位，初中為 1 位，高中五專與大學則各有 3 位。參與者受訪的地點為各區的老人服務中心、公園以及市場，研究者在這些地點隨機詢問外表似乎為六十五歲以上的老年人；在確定其年齡之後，再進一步的說明來意，就近尋找可坐下談話的場地，例如老人服務中心的交誼廳、公園涼亭與市場的休息桌椅，進行訪談。

大學生參與者為十位選修普通心理學之台大學生，他們是因為對此研究主題有興趣而向研究者登記，自願參與研究。參與者之選取以不集中於某一科系、年級為原則：十位參與者中，大一、大二學生各有 3 位，大三、大四學生則各有 2 位。

研究工具。研究一的目的，是要蒐集參與者對於「有面子」與「沒面子」事件的經驗或看法。研究者請參與者回答兩個開放式問題，分別為：「什麼事情會讓您覺得有面子？」「什麼事情會讓您覺得沒面子？」。使用的工具為記錄紙筆，與一份個人背景問卷。高齡組的個人背景的問卷包括十二個項目：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子女人數、居住狀況、收入來源、收入是否足夠、主觀健康狀況、有無工作經驗、目前有無工作與經常聊天的對象。低齡組的個人背景項目包括年齡、性別、科系與年級。

研究結果與討論

在《「面子」壓力及其因應行為》一文中，朱瑞玲（1989）將參與者對許多事件沒面子程度的評估做因素分析，結果得到四個因素：因素 I 為能力、身分；因素 II 為品德、道德、法律；因素 III 為名譽、尊嚴、行為失誤；因素 IV 為性道德。對照這四個因素所包含的面子事件，本研究的訪談結果，除了無人提及「性道德」的面子事件之外，另外三

個因素的面子事件皆包含在其中。雖然尊嚴、行為失誤屬於同一因素，但鑒於行為失誤與尊嚴事件內容差異性頗大，因此本文將尊嚴與行為失誤分開討論。

除了「能力」、「品德」、「尊嚴」與「行為失誤」四個類別之外，還有一些事件涉及個人與他人間的人際交往情形，則歸為「人際關係」。由於華人的面子感受不僅與個人自身行為有關，還會受到其關係密切者行為表現的影響（周美伶、何友暉，1992；陳之昭，1988；翟學偉，1995）；所以當參與者提到的面子事件涉及父母、子女、朋友或兄弟姊妹等人的表現，而不是個人本身行為時，則另外歸類為「親近他人表現」。

依據上述原則，本研究將訪談所蒐集到的資料分為「能力」、「品德」、「尊嚴」（尊重）、「行為失誤」、「人際關係」與「親近他人表現」等六類。提及各類訪談項目的人數，列如表二。

由表二所列的結果，可以看出：老年人與大學生對面子事件的看法有幾個值得注意之處：（1）老年人提到最多的能力事件為身體健康（十人中有八人提到）、大學生則為課業表現（十人中有八人提到）；（2）老年人參與者提及親近他人表現人數（八人提到）遠比大學生來得多（四人提到）；（3）老年人與大學生提及尊重、尊嚴事件的人數相同（各有五人提到），但所談的內容有明顯差異：老年人提及的互動對象為子女、媳婦與年輕人等晚輩，大學生未提及特定對象對他們不禮貌；（4）不論是老年人或大學生，都只在沒面子事件上提到品德事件。以下將引用參與者談話的內容，進一步分析老年人與大學生對面子事件看法的異同。所引用的文句為參與者原本回答的口語。在引述資料時，同時附註參與者的編號與事件類別，例如「O-1- 有面子」，代表編號 1 的老年人參與者（Old，簡寫成 O）在有面子事件上的看法；「Y-1- 沒面子」則代表編號 1 的大學生參與者（Young，簡寫成 Y）在沒面子事件上的看法。

能力

高低齡組所談涉及能力的面子事件，其內容分歧性頗大，這是因為老年人與大學生重視的生活場域不同，其中所強調的能力也有所差異。老年人最常提及的能力事件為身體健康。以往許多有關老人需求的研究發現：老年人最關心的就是自己身體的健康（徐立忠，1989）。隨著年齡的增長，個人的健康逐漸衰退，直接影響其認知能力的表現，而認知能力的情況又會影響個人日常生活的活動與功能（Poon Martin, Clayton, Messner, Noble & Johnson, 1992）；因此身體健康的好壞將直接影響老年人處理事情的能力。

『身體健健康康的、不會拖累別人，自己照顧自己、做事不求人；可以自主，凡事自己可以處理，甚至可以替別人做事、服務。』（O-1- 有面子）

『身體健康很差，要躺在床上讓別人照顧。什麼事情都不能做，別人在做其他事情的時候，你就只能躺床上、不然就是去看醫生。』（O-6- 沒面子）

「健康」是大多數的老年人都會擔心的一個問題，它是晚年生活是否幸福的要素之一。對老年人來說，身體是否健康會影響自己處理生活事務的能力，也將決定他會不會「拖累別人」，能不能「做事不求人」。「需要別人照顧」意味著自己沒有能力把事情做好，如果自己「什麼事都不能做」、「要求別人幫忙」，那是件會損及個人面子的事。健康狀況不良的「生病」除了可能影響個人能力之外，也會讓老年人產生「沒面子」感受。

『生一些不光彩的病，像是精神方面的疾病。不敢讓別人來探病，也不敢讓別人知道。得這種病表示你的心理思想有些問題，會覺得沒面子，不怎麼光彩。』（O-2- 沒面子）

在一般人的觀念中，得到精神疾病會受到他人指指點點，所以患者不敢大大方方地到醫院精神科看診，更不用說「讓別人知道」，或是「讓別人探病」。年輕一代的病人思想比較開放，可以接受精神疾病並不是不可告人之事，有些公衆人物甚至敢於公開自己的病情。但是許多老年人仍然像參與者 O-2 一樣，認為這是「不光彩」的事，而感到沒面子。這種疾病「不欲人知」所引發的沒面子感受，不僅是因為它可能損害個人能力，而且是因為他們顧慮到社會大眾對這些疾病的觀點與評論。

至於其他的能力，諸如金錢、身分、以及替他人解決困難等，提到的老年人並不多；尤其是在運作社會中所重視的工作能力和成就，更是無人提及。對於回歸到親密社會中的老年人來說，這些能力可能並不是最重要的。相形之下，大學生主要的社會角色是學生，他們在學校系統的生活場域中，必須面對他人不斷的評估與比較其學業成就。他們所重視的是個人在課業上的表現，提及的能力事件也大多與此有關。

『在公開比賽或是競試中獲得良好的名次；因為這就表示你比別人強，比別人厲害。』（Y-2- 有面子）

『有時候在課堂上老師會點人起來回答問題，如果點到自己，當場又回答不出來，就會很不好意思、沒面子。別人都會的問題，自己卻不

會，感覺很遜。』(Y-5-沒面子)

個人表現好壞，往往是「人比人」比較出來的。社會比較的結果產生了等級次序，社會臉面的大小則是依此而決定的(陳之昭, 1988)。與老年人相比，大學生較常遇到社會比較的情境，這一方面是因為大學生所處的生活場域重視評比，另一方面同儕間的年齡、背景與目標等方面都很相似，容易產生比較的心態。大學生參與者在訪談中所用的詞語，像是「公開比賽或競試中.....」與「別人都會的問題，自己卻不會.....」，都在指稱一種「社會比較」的情境。比較的結果反映出個人的能力，「比別人強、比別人厲害」就有面子；比他人差，則覺得沒面子。經由「比較」可以突顯個人能力的獨特性，能夠做到別人做不到的事，就會格外感到有面子。

『考試考第一，可以領到不容易申請的獎學金。因為這些事並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做到的。』(Y-3-有面子)

除了和他人比較可以證明自己的能力之外，他們也很重視他人對自己能力的肯定與稱讚(十人中有七人提到)。

『在公開場合被「權威」肯定自己的能力表現與做事的態度，「權威」是指老師或專家之類的人。』(Y-3-有面子)

『在大家面前被稱讚，例如在朋友面前被老師稱讚自己事情做得很好、報告寫得很好等等。』(Y-2-有面子)

『自己的所作所為得到師長和同儕的肯定與誇獎，在眾人面前接受表揚。』(Y-9-有面子)

受到他人的稱讚，就是他人對個人能力的肯定。如果這個稱讚自己的「他人」具有專業權威，則他的肯定更有說服力，更能證明個人能力的表現優越。在學校中，「老師」代表一種能夠評估個人能力的權威，得到老師的稱讚，會比得到其他非權威的稱讚更加有面子。更重要的是，這樣的稱讚必須要在「公開場合中」或是「眾人面前」進行才有意義，藉此才能感受到「我的能力受到大家肯定」的訊息。除了注重課業之外，參與團體活動也是某些大學生的生活重點之一；在這方面表現傑出的能力，也會增加個人面子。

『身為一個團體的領導者，像是社團幹部、班級幹部，沒有把事情做好，或是領導方式錯誤，造成團體表現不佳。』(Y-2-沒面子)

『自己被指派或推選籌畫一個大型活動，結果可以獨自完成，又辦得很成功。被交付做一件很簡單的事情，結果卻把事情搞砸了。換做任

何一個人都可以做好的事，自己卻做不好。』
(Y-5-有面子/沒面子)

Y-5 所說：「換做任何一個人都可以做好的事，自己卻做不好」，仍具有社會比較的意味。並不是把事情做好，就會有面子，要以個人力量「獨立完成」自己負責事情，才會真正感到有面子。若是藉助他人的幫助，才能把事情做好，不但不會感到有面子，反而會覺得沒面子；就如以下 Y-1 所做的回答。

『成就是自己得來的。就是靠自己的努力、能力而成功，不是因為別人才得到的。如果被別人說自己的成就都是倚靠別人才有的，像是說你靠著和某位親人、某個朋友的關係才有成就，那樣會沒面子。』(Y-1-有面子/沒面子)

許多大學生都會和 Y-1 的參與者一樣，不僅是要求自己把事情做得成功，還必須是只有靠個人力量達成，不是由他人所促成。這種重視「獨立自我」表現的態度，也可以說明為什麼大學生較少提到「親近他人的表現」。

尊重

「面子」是從他人獲得的尊重與敬意(Ho, 1976)，若不受人尊重，就可能感到沒面子。尊重含有「依禮而行」的意味，與他人互動時，對方的行為表現違背禮儀，就可能使個人感到不受尊重而覺得沒面子。尤其是對方違背「尊尊原則」或「上下關係」時，會使個人產生更大的面子威脅。

『坐公車的時候，不知道自己要下車的那一站到了沒有，就去問司機，問了好幾次他都不理、不回答，過了好久後才回答你；回答的時候講話的口氣很差、很沒禮貌、不耐煩，好像不知道那一站到了沒，是我不對。還有就是在公共場所中，有些年輕人用很不尊敬的態度對你講話，嫌你動作慢、事情做不好，甚至說些輕蔑、諷刺你的話，聽了很不舒服，感覺很不被尊重。剛才說的公車司機年紀也不怎麼大。你們這些年輕人，對老人家就是應該有禮貌，不要這樣讓老人家沒面子；有一天你們也是會老的.....』(O-1-沒面子)

『言語上被別人欺負，就是有時候別人對你不禮貌，不尊重你，和你講話態度很不客氣，好像他比你大的感覺；還有就是會被晚輩數落，像是被兒女、媳婦挑東挑西的，嫌你這裡不好、那裡不好，要你這樣做、那樣做的，你自

己做的都是不好就對了。』(O-10-沒面子)

在年輕人的眼中，難免會認為：老年人在行動上或處理事物的成效上，是「動作慢」或「做不好」。有些老年參與者很明確指出：讓他們感到不受尊重的事件中，涉及的行動對象是年輕人或兒媳；對老年人來說，這些人都是晚輩，照理應該對他們有所尊敬。藉由年齡所得到的地位，是儒家禮教文化傳統所強調的；而為人父母所得到的地位，則是在個人親密社會中由血緣關係所賦予的。對老年人來說，後者會比前者來得重要，因為他們通常會特別關注親密社會中互動對象的行為表現。

大學生參與者也有人提到，因為不受尊重而感受到沒面子，但並沒有人指出：何種特定對象對他們表現出這種行為，才會讓他們沒面子。

『被別人當眾羞辱，被羞辱就很沒面子了，又當著大家的面前，更是沒面子。因為這樣做（去羞辱別人）很不應該，被羞辱感覺很不被尊重。』(Y-8-沒面子)

『當街被別人罵、當場被指責，因為這樣大家都知道你被罵。不一定被誰這樣罵，都會沒面子就是了。』(Y-1-沒面子)

由Y-1與Y-8的回答中，可以看出：是這種特殊的「社會情境」讓他們感到沒面子，而不限於那些特定對象。老年人的回答，卻特別著重這種情境中的某些特定「對象」。Y-1與Y-8參與者的回答，強調了「面子」事件的一個重要層面，「……當眾羞辱」、「當街被罵、當場被指責……」，諸如此類的用詞皆指出當時的處境為「公開場合」；只有他人公開表現出差辱的訊息時，才會讓人感到失面子(Huang, 1987)。

親近他人表現

關係密切者的行為表現也會影響個人的「面子」(周美伶、何友暉, 1992)，尤其是子女的表現，更是如此。華人的文化傳統常將父母與子女間的關係視為「一體」，並稱之為「骨肉之親」，因而很容易使個人產生「大我」之間那種「一榮皆榮、一辱皆辱」的獨特感受(黃光國, 2001)。

『自己的孩子生活過得很好、做人行得正當，就是有自己的事業成就、做事憑良心，不做虧心事；兒女就是自己的一部份，他們好就是你好。』(O-7有面子)

『自己兒子做壞事然後被抓去關起來，就是做了違反道德法律的事情。如果是朋友這樣，還

可以和他保持距離、不會沒面子。可是自己的兒子這樣，就是你的責任，這是分不開的。』

(O-9-沒面子)

從O-7與O-9的回答中，可以看出他們跟子女之間強烈的「一體感」：子女的成就就是自己的成就，子女的表現就有如他們自己的表現。參與者O-9的回答更是指出一個重點：自己可以決定如何安排朋友關係的親密程度；而親子之間由血緣連結所產生的一體感，會比其他關係來得穩固，父母與子女的關係是斷不了與去不掉的。當朋友的行為表現優秀，有助於個人的面子，可以拉近彼此的關係；反之，當朋友的行為表現拙劣，有傷於個人面子，則可以設法使彼此關係疏遠。但是子女的表現無論好壞，做父母的都會感同身受。

除了「一體感」之外，「責任感」也可能使老年人因為子女的表現而影響個人面子感受。華人文化傳統一向認為：教育下一代是為人父母的責任。在日常生活中，我們不時會聽到這樣的批評：「不知道他的父母是怎麼教的，教出這樣的小孩」，或是這樣的稱讚：「是你教得好，孩子們都那麼優秀」。將兒女表現的好壞歸因於父母的教育成敗，兒女表現優劣，在某種程度上，代表了父母教育的成效，是身為父母的「個人責任」。這樣的「責任感」，使得老年人與子女間的「一體感」更加緊密。

對大學生的面子感受而言，親近他人的表現也有類似的影響：

『親人通過重要考試、升等、金榜提名，像是父母、兄弟姐妹，有一種與有榮焉的感覺。』(Y-9-有面子)

『有怪怪的親人或朋友會覺得沒面子，他們行為舉止很怪異。別人就會和你說：你的誰誰誰很奇怪，聽了就會很不好意思、沒面子。因為那個人和你有關係，他被人家這樣說，好像是在說你一樣。』(Y-1-沒面子)

參與者之所以會有「與有榮焉」、「……好像在說自己一樣」的感受，也都是因為認同對方，與對方有「一體感」。老年人與大學生不同之處，在於老年人提到親近他人表現的人數，為大學生的兩倍，而且老年人所說的親近他人皆為子女，大學生提到的親近他人包括親人朋友，並不限定於父母。這可能是因為老年人的主要的生活場域是親密社會，子女又是他們關注的焦點；大學生正準備進入運作社會，朋友是他們日常生活中互動頻繁的重要對象，因此他們也會認同於朋友，和朋友間有「一體感」的存在。



品德

在華人社會中，「道德性的臉面」不但與「五倫」有關連（Cheng, 1986），與「恥」更有關聯（金耀基，1988）；尤其是一個人違反了「不得作為」的「消極義務」（negative duties）而為人所知，更可能產生羞恥感（黃光國，2001），而感到沒面子。在本研究中，提及道德事件的參與者人數雖然不多（高齡組有二人提到，低齡組有四人提到），但不論是高齡組或低齡組，都是在沒面子事件中提到，其內容都是違反「不得作為」的「消極義務」。

『做一些不法勾當被發現，像是貪污之類的；因為那些事做不得，有損一個人的人品。』（O-3-沒面子）

『偷東西被抓到、說謊被拆穿，本來就不應該做、做了又被發現，會被唾棄。』（Y-10-沒面子）

這種「羞恥感」所導致的道德性臉面子之喪失，不僅只是因為他知道有些事是「做不得」與「不該做」，受到「自律性」的內在道德規範的約制，同時也會因為他人的評價而產生。參與者所說的「被發現」、「被拆穿」都是受到社會他人的評價與議論所致；一旦他人對個人品德產生負面評價，就等於對個人為人的否定，使個人很難繼續在原來所屬的團體中立足。

從以上結果，已經可以看出：本研究所主張的三個命題確實有其趨勢存在。這樣的結果雖然初步支持了研究者的想法，但並不能看出：個人與親近

他人的成就以及品德表現，讓老年人與大學生產生的「有面子」與「沒面子」感受，其程度上有什麼分別？當個人處在不被尊重的面子威脅情境之下，那一種關係對象讓他們產生最強烈的沒面子感受？對老年人與大學生來說，這樣的對象其性質有何差異？這幾個問題在初步訪談中得不到答案，必須再做進一步的探討。

研究二：個人的面子感受與「親近他人」的表現

研究一的結果顯示，老年人提及有關其親近他人之面子事件的人數為大學生的兩倍，這個現象與上述推論相符合。然而，這親近他人的行為表現對老年人面子感受，是否真的比大學生來得重要？為了探討這項問題，本研究特意以配對比較法（paired comparison）作為測量方式，比較老年人與大學生對於「親近他人」與「個人」本身的「成就」與「品德」表現，使個人產生「有面子/沒面子」感受的程度。比較的重點有三個：行為表現者（他人或是自己）、行為類別（成就或是品德）以及事件類別（有面子或是沒面子）。配對比較法主要是用在量度個人對不同刺激項之主觀心理量感受的差異（Thurstone, 1927a; 1927b），「面子」屬於個人的主觀心理感受，採用此種方法可以區分個人對不同「面子」事件感受程度的高低差別，突顯出本研究所要探討的問題。

根據本文之前的理論分析與研究一的結果，本研究預測：（1）在有面子事件中，子女表現會使老年人產生較大的「有面子」感受，大學生則會對個人成就表現感到較「有面子」；（2）在沒面子事件

表三

高齡組與低齡組在 A、B 版本上的配對比較項目

	高齡組（老年人）	低齡組（大學生）
A 版 有 面 子	1.自己工作表現好，在事業上很成功	1.自己課業表現很好，常在考試中拿第一
	2.自己為人正當	2.自己做人正當
	3.你最好的朋友工作表現好、在事業上很成功	3.你最好的朋友課業表現很好，常在考試中拿第一
	4.你最好的朋友做人正當	4.你最好的朋友做人正當
	5.兒女工作表現好，在事業上很成功	5.父母工作表現很好，在事業上很成功
	6.兒女做人正當	6.父母做人正當
B 版 沒 面 子	1.自己工作表現很差、在事業上沒什麼成就	1.自己課業表現很差、常在考試中排名倒數
	2.自己做了有損品德的事	2.自己做了有損品德的事
	3.你最好的朋友作表現很差，在事業上沒什麼成就	3.你最好的朋友課業表現很差，常在考試中排名倒數
	4.你最好的朋友做了有損品德的事	4.你最好的朋友做了有損品德的事
	5.兒女工作表現很差，在事業上沒什麼成就	5.父母工作表現很差，在事業上沒有什麼成就
	6.兒女做了有損品德的事	6.父母做了有損品德的事

中，不論老年人或大學生，個人品德都可能產生較大的「沒面子」感受。

參與者。研究二中的參與者的選取方式與研究一相同。老人參與者 56 人，其中男 27 女 29 人；最低年齡者 65 歲，最高年齡者 80 歲。56 位參與者皆有子女，其中 50 位已退休（佔 89.3%），只有 6 位仍在工作（佔 10.7%）。教育程度分別為小學以下 6 人、國小 17 人、國中 12 人、高中 11 人與大專 10 人。大學生參與者共有 54 人，其中男 24 女 30 人；最低年齡 18 歲，最高年齡 23 歲。年級分別為一年級 11 人、二年級 12 人、三年級 16 人與四年級 15 人。

研究工具。本研究採用問卷方式收集資料；所使用的測量方法為 Thurstone 發展出來的比較判斷法（comparative judgment）之第五型，又稱為配對比較法（method of paired comparison）（Thurstone, 1927a）。

比較項目係由兩個向度所構成，分別為敘述內容與敘述對象（見表三）。敘述內容涉及三種不同的對象：自己、兒女（或父母）與最好的朋友。對參與者來說，兒女（或父母）與摯友是「重要他人」，是較有可能包含於個人「大我」之中的社會對象。敘述內容則為能力與品德，分別涉及社會臉面與道德臉面。描述對象與內容組成六個比較項目（3×2），配對組的次序隨機排列，每位參與者必須作十五次的兩兩配對比較。參與者在每組兩兩配對中，必須選出個人認為比較有面子或比較沒面子的敘述句。

兩組參與者所使用版本的差異在於：三種描述對象中，老人組的親近他人為「子女」與好朋友，在大學生組則為「父母」與好朋友；在能力內容的敘述上，老人組為工作成就表現、在大學生組則為課業成績表現。兩組參與者所使用的測量工具，各分為 A、B 兩種版本：版本 A 的項目內容為「有面子」的正向敘述句；版本 B 的項目則為「沒面子」的負向敘述句。綜上所述，四個版本的配對比較項目內容，列如表三：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有面子事件

將兩組參與者對測驗材料配對比較所得的結果，依 Thurstone 所發展的計量方式，計算其 F 矩陣、P 矩陣與 Z 矩陣、累積值、平均數與調整後平均數。並將兩組參與者在有面子事件上，配對比較後所得各項目的原始平均數分別列於圖一（A）、（B）。圖中數值大小的意義為：參與者在各項目上，感受到有面子或沒面子的程度高低。由圖一（A）可以看出：老年人對兒女在「品德」（0.719）及「成就」（0.647）方面的表現最可能產生

「有面子」的感受，個人的表現反而不是他們最關心的重點（品德與成就分別為 0.495 與 -0.004）。相較之下，圖一（B）的結果顯示：大學生感覺最有面子的事件，與老年人截然不同；他們最關心的是個人的「成就」（1.312）與「品德」（1.231）表現，父母的表現則次於個人的表現（成就與品德分別為 0.151 與 -0.087）。

這可能是因為「有面子」是一種「獲取式的顏面」（acquisitive face），必須在「運作社會」中爭取得來，即所謂：「爭名於朝，爭利於市」。老年人退居親密社會，不再像準備進入運作社會的大學生那樣，經常要在個人能力表現方面與他人做競爭比較，因此個人表現不再是他們關注的焦點。相反的，華人的文化傳統一向把子女視為個人「大我」的一部份，再加上子女有好的表現，可以歸功於自己教育成功，等於是自己的成就，所以子女表現讓老年人所產生的有面子感受，反而大於個人自己的表現。或許是因為他們已經不需要再和他人作能力方面的評估比較，在個人表現部分，老年人認為較有面子的事件是個人品德（0.495），而不是運作社會中的個人能力成就（-0.004）。

正要準備進入運作社會的大學生，情況就不是如此。讓他們覺得最有面子的事件是個人的成就；成就必須由個人能力爭取得到，才有增添面子的效果。由於他們所處的學校系統不斷地在評量、比較他們課業能力的表現，所以個人課業能力表現會讓他們產生最大的有面子感受，而個人品德次之。在配對比較中，各刺激項目所得平均值之大小差異，可以反映出參與者對它們重視的程度。圖一（B）顯示：自己的表現是大學生面子感受最重視的焦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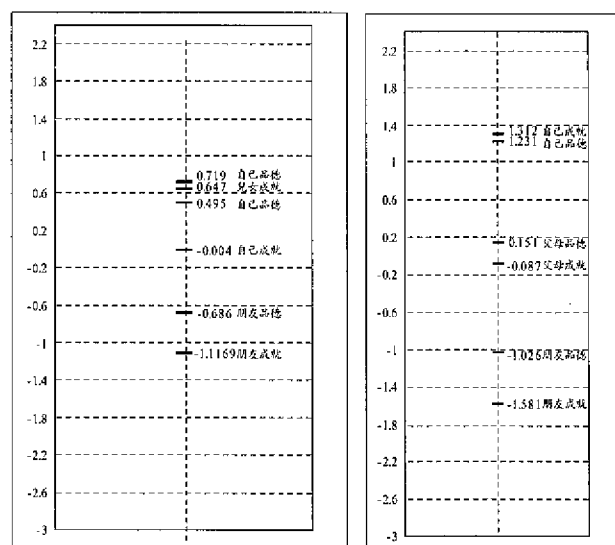


圖 A：高齡組

圖 B：低齡組

圖一：高齡組及低齡組參與者在「有面子」事件的配對比較結果

父母與好朋友的表現對個人有面子感受的影響，皆遙遙在後，而好朋友在「品德」與「成就」方面的表現又次於父母。

對大學生來說，好朋友是其社會網絡中的重要他人，與好朋友之間也可能因為社會認同而產生「一體感」。但是因為好朋友與自己同樣處於學校場域中，都要在能力方面接受評比，有時候還必須與好朋友作競爭。好朋友的成就表現不但不會讓個人沾光，反而可能蓋過個人的光芒，使自己「被比下去」。所以好朋友的成就表現(-1.581)，對大學生所產生的有面子感受是最少的。老年人對「朋友成就」的感受，也類似如此。老年人的生活網絡以情感性關係為主，其中又以有血緣關係的家人為重。對老年人來說，好朋友的成就(-1.1169)表現並沒有特殊的意義，因此相較之下，好朋友表現對個人所產生的有面子感受，不如子女與個人的表現。

沒面子事件

兩組參與者對沒面子事件配對比較，各項目所得的原始平均數，繪如圖二(A)、(B)。圖二顯示：不論老年人或大學生，可能產生最大沒面子感受的事件都是個人的「品德」。這可能是因為「有面子」是一種「獲取性的臉面」(acquisitive face)，必須靠個人努力爭取方能獲致而來，親近他人的表現也可能成為獲取面子的方式之一。相反的，「沒面子」則是「保護性的臉面」(protective face)，個人必須盡量避免喪失面子。因此在維護面子方面，會特別重視個人品德。而且個人品德比親人品德更可能引起較大的沒面子感受。

成中英指出：社會性面子(面)與道德性面子(臉)的關係就像如儒家思想中的「名」與「實」，由一個「實」可以衍生多個「名」(Cheng, 1986)。換言之，個人的社會性面子可以有很多個，他所擁有的道德性臉面卻只有一個。道德性臉面是做人的基本底線，不論在何種場域中，都不可以喪失；一旦失去它，會讓個人覺得很沒面子。而且，品德不佳所招致他人的非議，通常都比能力不足所導致的失敗更加嚴重。因為追求成就所導致的失敗，參雜有各種不同的因素，有些因素並不是個人可加以控制的；但是品德的喪失，主要取決於個人本身意志的「為」與「不為」，並沒有太多外在的理由。他人對自己品德的良好評價一旦喪失，自己等於是被貼上一種無形的標籤，個人很難撕下這個標籤，重新爭取回原有的道德臉面。所以在有面子事件中，以子女表現為重的老年人，在沒面子事件上，還是比較重視自己的品德表現。

不論是對於老年人或是大學生，沒面子感受程度次於個人品德的事件，都是親人(子女或父母)的品德表現。對於華人而言，家人間的關係是不可

斷裂的，家庭中的成員如果有人做了違反道德規範之事，全家人都可能感到「蒙羞」，並視之為「家醜」。尤其是親子間的關係，華人常視之為一體。對老年人而言，這樣的現象更為明顯，因為親子間不僅有強烈的一體感，而且子女品德不佳，也意味著家庭教育失敗，間接否定了個人對子女所施行的品德教育，是對個人教育能力的質疑。

圖二中(A)、(B)兩者的比較結果還顯示：對大學生而言，朋友品德不佳比父母成就不好，讓他們覺得更沒面子；但是老年人並沒有這樣的反應。對老年人而言，朋友表現讓個人覺得沒面子的程度，始終次於自己與子女的表现。這一點是很值得注意的：大學生和好朋友之間的「一體感」，較可能出現於不影響自我評估的品德項目上。大學生和老年人不同，他們的社會網絡除了家人之外，還包含有其他屬於情感性關係的對象，個人所認同的「大我」也可能包含這些對象。這樣的一體感較不可能出現在學業能力成就上，因為這類事件會影響自我評估，造成所謂的「社會比較效果」(social comparison effect)。

「社會比較效果」是指：如果他人某一方面優秀的表現是與個人的自我認定(self-definition)有關，這個人與個人的關係愈親近，愈可能會威脅到個人的自我評價。當個人好朋友的學業成就表現欠佳，可能讓個人有向下比較的機會而自我彰顯(self-enhancement)，因此不會覺得沒面子。在品德方面，並不會產生這樣的比較效果。在一般的情況下，父母親從小就教育子女：「不要交壞朋友」，如果個人交往的朋友品德不佳，他人會視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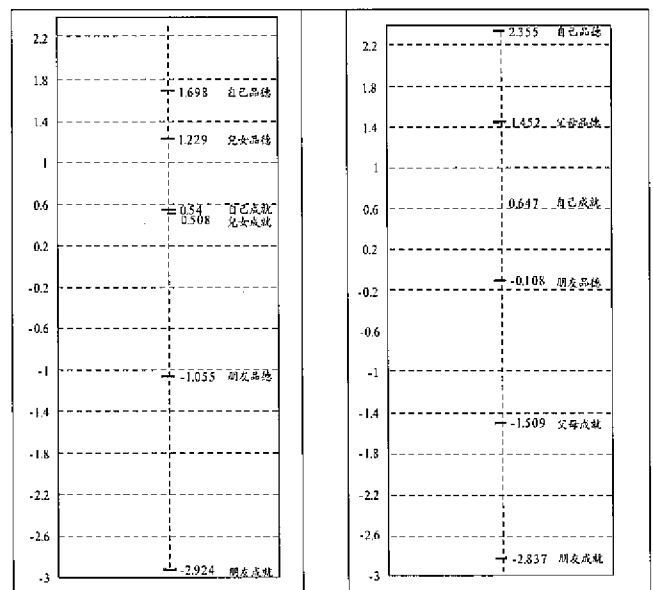


圖 A：高齡組

圖 B：低齡組

圖二：高齡組及低齡組參與者在「沒面子」事件的配對比較的結果

表四

品德事件與成就事件的配對比較差值

	高齡組		低齡組	
	有面子事件	沒面子事件	有面子事件	沒面子事件
自己品德-自己成就	0.499	1.158	-0.081	1.709
兒女品德-兒女成就 (父母)(父母)	0.072	0.721	0.237	2.961
朋友品德-朋友成就	0.483	1.868	0.205	2.728

「物以類聚」，不僅將個人視與之為同類，還會加以譴責。因此對大學生而言，好朋友的品德(-0.108)讓他覺得「沒面子」的程度，僅次於個人成就之後，而位於父母成就(-1.509)之前。

「道德臉面」對「沒面子」感受的重要性

在一般的情況下，人們往往視「遵守道德規範」為做人的基本原則，個人的道德行為表現良好，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情，不一定會得到他人的讚揚。也就是說，擁有「道德臉面」，不一定會使個人特別感到有面子。但是失去它，一定會遭到他人的譴責或非議，使個人產生沒面子的感受，而且其程度會比失去社會臉面嚴重許多。因此，在「有面子」事件方面，較不能顯示出「道德臉面」對個人面子感受的影響；在「沒面子」事件方面，就很容易顯現出來。

以配對比較法測量得到的數值大小，代表參與者對這些事件主觀心理感受的程度差別。兩事件之間的數值差距，表示參與者主觀感受的大小差異；差值愈大，表示參與者對此二事件的感受愈不相同；差值愈小，表示他們對此二事件的感受愈相近。在有面子事件中，「品德」對面子感受的重要性並不顯著，但在沒面子事件中則十分明顯。在沒面子事件中，不論是老人或大學生組，也不論他們所評估的對象為何，品德項目所引起的沒面子感受程度皆比能力成就項目高。以同一對象的品德事件與能力成就事件之數值差距作為指標，可以看出「品德」對沒面子感受的重要性（見表四）。表中正值表示品德項目數值大於成就項目，負值則表示成就項目較大。

從表四可以看出，在沒面子事件中，品德事件與能力成就事件的差值，遠大於它們在有面子事件中的差距。此一數據表示：在「有面子」的事件中，品德事件與能力成就事件，所產生的有面子感受較為相近；在沒面子的事件方面，品德事件則會比成就使個人產生較大的沒面子感受。這樣的差值比較，再次說明失去道德臉面對於產生沒面子感受的重要性。

研究三：「關係性質」與個人的「沒面子」感受

研究一與研究二的結果顯示：老年人的面子感受，大部分來自與「子女」相關的事件，大學生則是以與「自我」有關的事件為多。這是因為老年人與大學生置身於不同生活場域，可能影響他們面子感受的「人際關係」也有所不同。

退居親密社會的老年人，個人的面子主要來自血緣關係所「賦予的地位」，即為人父母所擁有的「權威地位」。當個人所面臨的情境威脅到他們為人父母的地位時，特別可能感到沒面子。依照本文緒論的討論，當上下關係中位居「下」者，違反了彼此互動的「尊/卑」原則時，如果居「上」者與居「下」者之間的地位差距愈大，則居「上」者感受到的面子威脅也可能愈嚴重。依據這樣的推論，當老年人認為自己對子女的權威性愈高，一旦子女的行為威脅到他們身為父母的「地位」，所產生的沒面子感受也會愈強烈。相反的，正準備進入運作社會的大學生，其面子主要來自個人能力表現所「獲致的地位」。當個人能力受到否定時，才會格外感到沒面子。在學校系統中，「老師」代表評估其課業表現的權威；若大學生認為老師所具有的權威性愈高，表示個人愈認可老師評估自己的能力，一旦能力遭到老師的否定，沒面子程度也就會愈強烈。

當互動雙方中的任何一方，公開譴責另一方，其行為表現違背了日常的禮俗，會造成另一方的面子威脅，引發個人「沒面子」的感受（Brown & Levison, 1978）；在研究一的訪談中，也有多位參與者提到此類面子事件，其中又以受到對方公開指責的情況居多。因此，研究三將以文字描述此類型的「面子威脅情境」，讓參與者設想：處在此一情境中，各種關係對象公開譴責自己，讓自己感受到沒面子的程度。這樣設計的目的，主要是想探討：不同關係對象讓個人感到沒面子程度的差異，以進一步檢驗「老年人主要的面子來源為賦予之地位」。



即為人父母的權威；大學生則為獲致之地位，即課業能力表現」的論點。

綜上所述，本研究的假設是：（1）由不同關係對象所引發的面子威脅情境，最可能讓老年人感到沒面子的對象，是親近度最高的「子女」。（2）最可能讓大學生感到最沒面子對象，是有能力評估個人成就的「老師」。

參與者。研究三的參與者與研究二相同，老年人（高齡組）56人，大學生（低齡組）54人。高齡組參與者對此部份的作答有三份無效，有效問卷共53份。

研究工具

本研究係以簡單的「情境故事」（scenario）的方式收集資料。在一段情境敘述之後，請參與者以四點量表評估各個關係讓他們感到「沒面子」的程度，以及個人主觀認為與這些對象間的「親近性」和「權威性」。以下將對本問卷中的「情境敘述」、「關係對象」、「沒面子感受」以及「關係性質」，做進一步的說明。

（一）情境敘述。為了讓參與者能夠進入面子威脅的情境之中，在問卷的最前面有一段說明情境的文字敘述：

「當有別人在場時，如果有『某人』以很不禮貌、不客氣的態度指責您一個小的行為錯誤，這樣的行為不會讓您覺得沒面子？」

此敘述讓參與者能具體了解面子威脅情境的特點在於「有他人在場的情況下」、「不禮貌、不客氣地指責」，這些都是可能引發個人沒面子感受的主要線索。

（二）關係對象。為了探討參與者在面子威脅情境中，不同對象對自己沒禮貌所產生的沒面子感受，本問卷列出老年人與大學生在日常生活中，有互動可能的五種關係對象：不認識的年輕人、不認識的老年人、兒女（低齡組則為父母）、好朋友以及醫生（低齡組則為老師）。「不認識的年輕人」與「不認識的老年人」皆屬於陌生人，其差別在於年齡的高低。這樣的區分是為了探討年齡的差異是否蘊含有權威高低的意義，及其可能影響個人沒面子感受的程度。

（三）面子感受程度。這是本研究想要探討的主要部分。參與者必須設想自己處在上述情境中，評估不同對象的行為讓自己感到沒面子的程度。評定方式採取 Likert 式四點量尺，由「0」至「3」分別代表沒面子程度的多寡：量尺上「0」表示「不會感到沒面子」，「1」表示「有點沒面子」，「2」表示「沒面子」，「3」表示「非常沒面子」。採用四點量表的原因是偶數量尺可以避免參與者以中間反應來作答。

（四）關係性質。根據本文「引論」有關「關

係與面子」的討論，一般而言，華人通常是根據「親疏」與「尊卑」兩個向度，來評估自我與他人的關係。所以問卷中有兩個部分，要求參與者針對不同的關係對象做「親近性」與「權威性」的評估。其中「權威性」有方向性的區別，在低齡組是要求受試評估：「此關係對象對個人的權威程度」；在高齡組中，除了「醫生」之外，要求參與者評估「個人對此關係對象的權威程度」。由於「醫生」是一種專業權威，一般來說，對個人具有權威性，因此要求參與者評估「醫生對個人的權威程度」；在記分上，則以負值表示。

親近程度與權威程度也是採用 Likert 式的四點量尺來衡量，由「0」至「3」，程度的增減，分別代表親近性或權威性的高低：量尺上「0」表示不親近或不權威，「1」表示有點親近或有點權威，「2」表示親近或有權威，「3」非常親近或非常權威。

研究結果與討論

在社會互動中，若互動的雙方皆依「禮」來表現行為，則沒有所謂的「失面子」或「沒面子」；一旦有一方破壞「禮」的行為準則，就會引發另一方的面子威脅，使其產生「沒面子」的感受。本研究設定情境，理論上會引起個人沒面子感受，本研究的發現也確是如此。本研究的結果顯示，參與者對此情境所評估「沒面子」感受程度的平均數，皆不為「零」，表示在此種情境下，個人通常都會感到「沒面子」，只是因為對方與個人關係不同，而有程度高低的差異。

（一）關係對象與其關係性質

1. 親近性。在理論上，對個人而言，子女（或父母）與好朋友皆屬高情感性關係對象，與個人之間的情感性成分大於工具性成分（黃光國，1988，1995）；對大多數的人來說，老師與醫生是屬於工具性或混合性關係，情感性成分有限；不認識的老年人與年輕人則是「陌生人」的角色，屬於「沒有關係」的社會對象，彼此之間的情感性成分應比前述兩類關係對象少。結果顯示，高齡組（ $F(4, 52) = 142.81, p < .0001$ ）與低齡組（ $F(4, 53) = 132.43, p < .0001$ ）對於不同關係對象的親近性所做的判斷，確實有差異存在，並且符合上述理論的說法（見表六、表七與圖三、圖四）。不過對老年人來說，「不認識的老年人」的親近性（1.25）高於「不認識的年輕人」（0.64），這可能是因為年齡的差距，讓老年人感到與年輕人之間有隔閡，感覺比較不親近，對年紀相仿的老年人則比較有親切感。

2. 權威性。在理論上，對個人而言，父母、醫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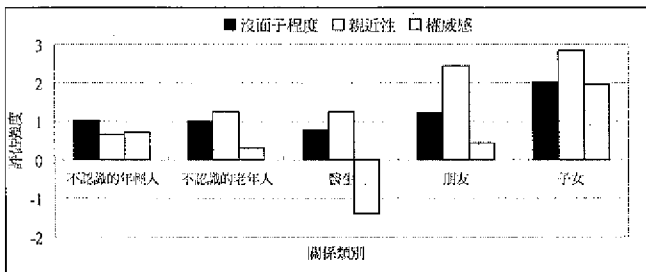
表五

高齡組參與者評估各種關係對象的沒面子程度、親近程度以及權威度之平均數與事後比較結果

	關係對象	平均數	事後比較
沒面子程度	子女	2.04	A
	好朋友	1.23	B
	不認識的年輕人	1.02	B C
	不認識的老年人	1.00	B C
	醫生	0.79	C
親近度	子女	2.85	A
	好朋友	2.43	B
	醫生	1.25	C
	不認識的老年人	1.25	C
	不認識的年輕人	0.64	D
權威性	子女	1.96	A
	不認識的年輕人	0.72	B
	好朋友	0.45	B C
	不認識的老年人	0.32	C
	醫生	-1.42	D

註 1：事後比較係採取 REGWQ (由 Ryan, Einot, Gavriel & Welsch 的事後比較法發展出來) 之事後檢定方式
 註 2：事後比較結果欄中，不同的字母代表事後比較有差異存在。

與老師都是權威關係的居「上」者，朋友是平行關係，陌生人則通常沒有所謂的權威性可言。本研究的結果顯示，高齡組 ($F(4, 52) = 138.09, p < .0001$) 與低齡組 ($F(4, 53) = 76.20, p < .0001$) 參與者對於不同對象所感受到的權威程度，確實有差異性存在，但是並不完全符合理論上的說法：雖然「不認識的老年人」與「不認識的年輕人」都是屬於陌生人，但是參與者對此兩者的權威性感受卻有所不同。個人對陌生人的權威性感受，會受到對方年齡大小的影響。在中國社會中，年齡長者蘊涵某種程度的權威性，所以即使「不認識的老年人」與「不認識的年輕人」皆為陌生人，權威性也會有所



圖三：高齡組參與者評估各種關係對象的沒面子程度、親近程度以及權威程度之平均數

表六

低齡組參與者評估各種關係對象的沒面子程度、親近程度以及權威程度之平均數與事後比較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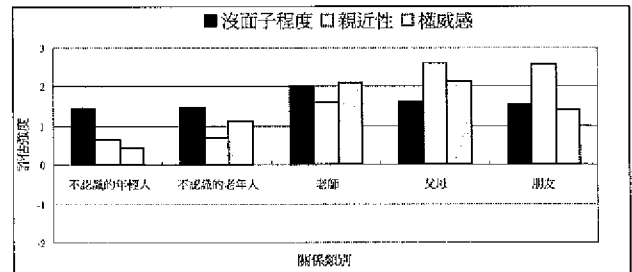
	關係對象	平均數	事後比較
沒面子程度	老師	2.03	A
	父母	1.65	B
	好朋友	1.53	B
	不認識的老年人	1.48	B
	不認識的年輕人	1.46	B
親近度	父母	2.63	A
	好朋友	2.57	A
	老師	1.61	B
	不認識的老年人	0.70	C
	不認識的年輕人	0.67	C
權威性	父母	2.13	A
	老師	2.09	A
	好朋友	1.41	B
	不認識的老年人	1.13	C
	不認識的年輕人	0.43	D

註 1：事後比較係採取 REGWQ (由 Ryan, Einot, Gavriel & Welsch 的事後比較法發展出來) 之事後檢定方式。
 註 2：事後比較結果欄中，不同的字母代表事後比較有差異存在。

差異：對老年人來說，他們覺得自己對「不認識的年輕人」(0.72) 之權威性大於「不認識的老年人」(0.32)；對大學生來說，「不認識的老年人」(1.13) 對他們的權威性大於「不認識的年輕人」(0.43)。

(二) 老年人與大學生沒面子感受的差異

不論是老年人 ($F(4, 52) = 22.15, p < .0001$) 或是大學生 ($F(4, 53) = 4.32, p < .001$)，當日常生活中可能接觸的各種關係對象對他們不禮貌時，他們感到的沒面子程度都有明顯的差異。但是讓老年人與大學生感到最沒面子的對象，其關係性質卻



圖四：低齡組參與者評估各種關係對象的沒面子程度、親近程度以及權威程度之平均數



是大相逕庭。

面子資源可從家庭地位與社會地位而來（翟學偉，1995），老年人的生活場域以親密社會為重，對他們來說，親密社會中所「賦予之地位」，尤其是在家庭中為人父母的輩分地位，可能是最重要的。本研究的結果顯示：讓老年人感到最沒面子的對象是親近性高（2.85），個人對他們具有最大權威性（1.96）的兒女（見表五與圖三）。如果最親近的兒女無禮指責他們，不僅違背了父母子女間的上下關係，也會威脅到他們為人「父母」的地位，因此可能特別感到沒面子。

換句話說，老年人的面子來源，主要是他們在家庭中對子女的權威性。個人主觀認為自己對子女擁有的權威性，不僅反映父母與子女之間上下關係的明確性，也反映出違反尊卑原則的嚴重性。當個人感到自己對子女的權威性愈大，兒女無禮的指責，愈可能使他們感受到嚴重的面子威脅，沒面子程度也就愈高（ $r = 0.431, p < .01$ ）。在此種情況下，老年人「賦予之地位」的維繫著重於關係性質中的「權威性」方面。

當關係對象為醫生時，老年人沒面子感受最小（0.79）。這可能是因為對老年人來說，醫生具有權威性（-1.42），而且其親近性不高（1.25），並不屬於個人親密社會中的對象。當個人遭到醫生指責時，一方面並不違反上下原則，另一方面也不影響個人在親密社會中的地位，其面子受到的威脅性最小，沒面子感受也最低。

在低齡組部分，結果顯示：讓大學生感到最沒面子的對象是老師（2.03）。老師對大學生來說，具有高度權威性（2.63）與中度親近性（1.61）（見表六與圖四）。當老師指責學生時，並沒有違反上下關係的原則；理論上，個人的面子威脅不會最大，沒面子的感受也不會最高。但是大學生在其生活場域中，特別強調能力表現與評估，其面子來源必須靠個人能力所「獲致之地位」。在他們所處的學校系統中，老師是一個有能力評估其成就的權威。當擁有權威地位的老師指責自己時，蘊涵有自己能力遭到否定的意味，因此會特別感到沒面子。個人認為老師具有的權威性愈大，表示個人愈認可老師具評估自己能力的專業與權力，當受到老師的指責，個人感受到的沒面子程度也可能會愈高（ $r = 0.359, p < 0.01$ ）。雖然父母也具有高度的權威性（2.13），但是父母所擁有的權威，是在親密社會或家庭中的權威地位。父母的權威性愈大，當他們指責自己時，個人感受到沒面子的程度並不會因而愈高（ $r = 0.151, p > 0.05$ ）。

（三）年齡因素的影響

依照上下關係對面子的影響原則，居下者（權威性較低者）對居上者（權威性較高者）的行為違

反「禮」時，會讓在居上者特別感到沒面子。雖然老年人與大學生參與者對「不認識的年輕人」與「不認識的老年人」感受到的權威性有所不同，但是沒面子的感受卻沒有差異存在。這可能是因為沒面子感受的程度，並不能以單一「尊卑」關係向度來決定，還要考慮這個對象所扮演的角色，對個人重視的生活場域來說，是否有意義存在。

臉面的作用只有在社會交往中才能發揮出來（翟學偉，1995），所以在個人社會圈（social circle）中的互動對象，對個人臉面才有意義。「陌生人」的角色是屬於一種「沒有關係」的社會對象，對個人並無特殊的角色意義，而且幾乎不具情感性，並不包含於個人社會圈的範圍之中。對老年人來說，雖然個人對「不認識的年輕人」（0.72）的權威性感受高於「不認識的老年人」（0.32），但兩者都不會威脅到個人親密社會中所「賦予之地位」，因此沒面子程度並沒有特別高，兩者間沒有差異存在（ $F(4, 52) = 0.02, p > .1$ ）。基於相同的道理，「不認識的老年人」（1.13）對大學生的權威性比「不認識的年輕人」（0.43）大，但是此兩種對象皆不會影響個人能力評估，所以在沒面子感受程度上也沒有分別（ $F(4, 53) = 0.03, p > .1$ ）。

從本研究的結果可知，老年人與大學生以不同的生活場域為重，在特定的面子威脅情境中，對於何種關係對象會引起個人最大的沒面子感受，具有不同的考量焦點。

結語

每一種心理現象，都是建立於人們在社會組織中所從事的活動之上（Ratner, 1996, 1999, 2000）。因此，要了解某一種心理現象，就不能忽略它與個體所進行活動之間的關聯性。老年人生活場域的重心轉移至親密社會，從事的活動與正準備進入運作社會中的大學生必然有很大的差異。尤其面子具有個人情境認定（situated identities）的性質，更容易受到生活場域變化的影響。雖然本研究將「生活脈絡」此一要素考慮在內，但是仍然會受到以下三方面的限制：

探討議題的限制。「面子」是一個很複雜的概念，它包含許多層面的意義，其運作受到許多因素影響。從研究一的訪談資料中，就可以看出參與者對面子事件想法的豐富性與多樣性。本研究著重於不同生活場域中的「地位」，從「親近他人」與「不同關係對象」兩方面來探討老年人與大學生面子感受差異；除了此兩個論點之外，尚有許多議題值得深入了解。例如，一個人的「面子」在他人面前或他人背後，是很不一樣的，即所謂「面子」與「裡子」；「他人」與個人的關係性質為何，也是一個影響因素。又如，「老年人」此一群體，他們

的「面子」，必定與子女的「孝」或「不孝」，有某種關聯性存在；子女對他們的言語行為表現，牽涉的層面可能不僅止於個人的「面子」的而已。

以年齡作為「生活場域」改變的劃分依據，是一種概括性的方式，本研究以「退休老人」為主要參與對象，主要是為了釐清生活場域的分界。對未退休的老年人而言，他們並未退出其「運作社會」，個人表現與子女表現很可能是同等重要的，本研究的結果並無法類推到未退休老人的面子感受上。此外，性別也是個重要的影響因素，社會文化賦予不同性別之個體角色任務也有所不同。若以老年婦女與年輕婦女作為比較的對象，也可能得到不一樣的結果。

本研究試圖簡化複雜的面子問題，排除一些影響「面子」的因素，以突顯研究主題，這是本研究的優點所在。但是，也正因為如此，使得研究結果的解釋效力稍嫌不足，這也是本研究的限制之一。

方法上的限制。由於老年人對於文字的理解力、注意力與持久力，並不是很理想，因此在問卷題型與作答方式的設計，必須將此點納入考量。在研究二與研究三中，研究者分別採用配對比較法與四點量表評估，以達到簡單易懂而且容易完成的目的。但是，這兩種方法各有其不足之處，分別敘述如下：配對比較法主要是針對刺激項目做相對大小的對照比較，可以清楚顯示各項目間的大小關係。但是對於兩項目間的數值差異，並不能像其他統計方法一樣，很確實的指出此差異是否達到顯著的水準。四點量表（由0至3）的評估方式，可以對每一個數字，用文字加以敘述其代表的程度，使參與者很容易選擇符合自己看法的數字。但是，四點量表的敏銳度不如六點量表或八點量表。因此，資料分析的結果對於現象的解釋，仍有其限制範圍。

參與者的限制。本研究參與者只以大學生與老年人互為對照，對於身在運作社會，但是並不在學校系統中的年輕人，只能做理論上的推演，並沒有實際的資料可更明確的支持。此外，中年人也是一個未知的群體，他們的生活場域涉及運作社會與親密社會；當個人對兩個生活場域涉入程度相當時，個人的面子感受到底如何，這一點也值得做進一步探討。

本研究是一個初步的探討，所得到的結果可以作為一個起點，提供有意進行「面子」研究的研究者，一個新的思考方向。

參考文獻

- 朱瑞玲（1988）。中國人的社會互動：論面子的問題。見楊國樞（主編）「中國人的心理」，239-287。台北：桂冠圖書公司。
- 朱瑞玲（1989）。「面子」壓力及其因應行為。見楊國樞（主編）「中國人的心理與行為」，177-211。台北：桂冠圖書公司。
- 金耀基（1988）。「面」、「恥」與中國人行為之分析。見楊國樞（主編）「中國人的心理」，319-345。台北：桂冠圖書公司。
- 周美伶、何友暉（1992）。從跨文化觀點分析面子的內涵及其在社會交往中的運作。見楊國樞（主編）「中國人的心理與行為：理念及方法篇」，205-254。台北：桂冠圖書公司。
- 徐立忠（1989）。「老人問題與對策」。台北：桂冠圖書公司。
- 徐麗君、蔡文輝（1985）。「老年社會學-理論與實務」。台北：巨流圖書公司。
- 陳之昭（1988）。面子心理的理論分析與實際研究。見楊國樞（主編）「中國人的心理」，155-237。台北：桂冠圖書公司。
- 陳美光（1998）。「老人健康生活品質與健康習慣社會心理因素關係之探討」。國立台灣大學心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 黃光國（2001）。「儒家關係主義與華人臉面觀的分析」。未發表之論文。
- 楊國樞、莊耀嘉（1997）。角色規範的認知結構。見楊國樞（主編）「中國人的思維方式」，282-338。台北：桂冠圖書公司。
- 翟學偉（1995）。「中國人的臉面觀」。台北：桂冠圖書公司。
- 蘇建文、程小危、柯華蕙、林見文、吳敏而、幸曼玲、陳李綢、林惠雅與陳淑美（1997）。「發展心理學」。台北：心理出版社。
- Alexander, C. N., & Lauderdale, P. (1977). Situated identities and social influence. *Sociometry*, 40, 225-233.
- Alexander, C. N., & Rudd, J. (1981). Situated identities and response variables. In J. T. Tedeschi (Ed.), *Impression management theory and 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Alexander, C. N., & Wiley, M. G. (1980). Situated activity and identity formation. In M. Rosenberg, & R. Turner (Eds.),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social psychology*. New York: Basic Books.
- Boden, D., & Bielby, D. D. V. (1983). The past as resource. *Human Development*, 26, 308-319.
- Brown, P., & Levinson, S. C. (1978). *Politeness: Some universals in language usage*.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arstensen, L. L. (1991). Socioemotional selectivity theory: Social activity in life-span context.



- Annual Review of Gerontology and Geriatrics*, 11, 195-217.
- Carstensen, L. L. (1992). Social and emotional patterns in adulthood: Support for sociomotional selectivity theory. *Psychology and Aging*, 7, 331-338.
- Cheng, C. Y. (1986). The concept of face and its Confucian roots. *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13, 329-348.
- Chou, M. L. (1997). *Protective and acquisitive face orientations in Chinese social life validation study*. Unpublished manuscript.
- Ho, D. Y. F. (1976). On the concept of fac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1, 867-884.
- Ho, D. Y. F. (1994). Face dynamics: From conceptualization to measurement. In Ting-Toomey & Stella, et al. (Eds), *The challenge of facework: Cross-cultural and interpersonal issues* (pp. 269-286).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Hu, H. C. (1944). The Chinese concepts of face.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46, 45-64.
- Huang, S. (1987). Two study on prototype semantics : Xiao (Filial Piety), and Mei Mianzi (loss of fac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5, 55-89.
- Hwang, K. K. (1987). Face and favor: Chinese power gam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2, 944-974.
- Hwang, K. K. (1997). Guanxi and Mientze: Conflict resolution in Chinese society.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VIII, 17 -42.
- Kahn, D. R., & Antonucci, T. C. (1981). Convoys of social support: A life-course approach. In S. B. Kiesler & V. K. Oppenheimer (Eds.), *Aging: Social change* (pp.383-385).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Poon, L. W., Martin, P., Clayton, G. M., Messner, S., Noble, C. & Johnson, M. A. (1992). The influences of cognitive resources on adaptation and old age. *Aging and Human Development*, 34, 31-46.
- Ratner, C. (1996). Activity as a key concept for cultural psychology. *Culture and Psychology*, 2, 407-434.
- Ratner, C. (1999). Three approaches to cultural psychology: A critique. *Cultural Dynamics*, 7-31.
- Ratner, C. (2000). A cultural psychological analysis of emotions. *Culture and Psychology*, 6, 5-39.
- Rybash, J. M., Roodin, P. A. & Hoyer, W. J. (1995). *Adult development and aging*. Madison, MI: Brown & Benchmark.
- Stover, L. E. (1974). *The cultural ecolog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pp. 242-263).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 Thurstone, L. L. (1927a). A law of comparative judgment. *Psychological Review*, 34, 273-286.
- Thurstone, L. L. (1927b). Psychophysical analysis.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38, 368-389.
- Ting-Toomey, S. (1990). Intergroup diplomatic communication: A face-negotiation perspective. In F. Korzeny & S. Ting-Toomey (Eds.), *Communicating for peace: Diplomacy and negotiation* (pp. 77-95). Newbury Park, CA: Sage.



Face and Relation in Different Domains of Life: A Comparison Between Senior Citizens and University Students

Shan-Yun Su Kwang-Kuo Hwang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Differences between senior citizens and university students in the experience of various face-related emotions in contemporary Taiwanese society are explored. Based on our theoretical analyses of the Chinese concept of face, three hypotheses are proposed: (1) Senior citizens are more sensitive to face episodes related to their ascribed status in intimate society (i.e., their seniority as parents to their children within the family), while university students are more sensitive to face episodes related to their achieved status in operative society (i.e., their academic performance as students in the university). (2) Compared with university students, senior citizens are more sensitive to face episodes caused by significant others. (3) Both senior citizens and university students are concerned about maintenance of their moral face. Three empirical studies were conducted to test these

hypotheses. Qualitative data about face episodes collected in Study 1 supported all three hypotheses. Paired comparison tasks in Study 2 showed that senior citizens experience face through morality and achievement of their children, while university students are more sensitive to face episodes related to personal achievement and morality. Both groups felt loss of face for negative episodes of personal morality. In Study 3 participants evaluated their feelings toward a scenario of being publicly blamed by different social targets. Blame by one's own children was most likely to make senior citizens lose face, while blame by a professor had a greater effect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Keywords: domains of life, face-related emotions,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significant other

